

从庙堂到民间

——中国文学精神向近现代化转变的主体因素

白寅, 杨雨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中国文学精神向近现代的转变, 滥觞于唐宋, 激变于元代, 成就于明清。这是基于中国文学自身演变的主体因素而得出的结论。首先, 作为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 也就是传统的士大夫审美趣尚双重性的形成, 为文学创作精神向近现代转化提供了主观动因; 其次, 新兴的文学消费主体的涌现, 特别是城市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 决定了中国文学近现代化的审美价值取向; 再次, 文学主体的生活形态对文学的传播方式的影响决定着文学话语的转变; 最后, 是影响文学活动的环境, 也就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 规定了中国文学精神向近现代化转变的基本范式。

关键词: 文学精神; 庙堂文学; 近现代文学; 士大夫; 市民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3-0364-06

一谈到中国古代文学向近现代文学的转变, 人们总是习惯于联系西学东渐, 联系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但是, 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实践活动, 文学的演进应直接导源于文学主体精神的变异: 首先是作为创作主体, 其审美趣尚变化决定了文学创作实践走向; 其次, 文学的接受主体或消费主体的演变和审美价值取向的变化, 为文学的近现代化转变的活动提供了基本舞台; 再次, 文学主体的生活形态对文学的传播方式的影响决定着文学话语的转变; 最后, 则是影响文学活动的环境, 也就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 规定了文学主体的生活形态, 从而也规定了文学转变的基本范式。本文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考虑, 来具体考察中国文学精神从古代文学形态向近现代文学形态转变的主体因素。

一、中国士大夫审美趣尚的二重性与文学精神转变

闻一多先生曾指出, 中国文学在盛唐告一“天然段落”, 在此以前, 文学是门阀贵族的垄断物; 盛唐以后, 文学则属于士人, 似乎更具平民化的作风^{[1](30)}。

这给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实, 任何时代, 文学的主要创作主体都是士大夫, 只不过在唐以前, 这个士大夫阶层主要被门阀贵族所垄断, 其扮演的主要是政治角色, 即运筹于庙堂之上。唐以后, 科举制使部分民间的精英与士大夫阶层融合, 他们除传统的庙堂角色之外, 还越来越需要在平民中寻求安身立命之处, 其文学写作不可避免地要从庙堂向民间倾斜。这种审美趣尚的二重性的形成, 是中国古代文学向近现代化转变的最直接的主体因素。

所谓士大夫审美趣尚的二重性, 是指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政治抱负和职业理想引导的审美价值取向的贵族化; 另一方面, 由于他们中更多的人(尤其是唐宋以后)来自民间或者是作为处理民间事务的官僚, 多少保留着审美趣尚的平民化意味。比如, 晏殊、苏轼可以嘲弄别人作小词, 而自己却每每乐此不疲; 李梦阳一面推崇秦汉文章盛唐诗, 推重典雅与格调, 另一面又说“真诗乃在民间”。他们在得意之际, 把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 而在困穷之时, 却又寄情声色市井之间。这种状况的形成, 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生活形态的必然结果。

美国学者包弼德提出了中国士大夫在唐宋时期

转型的观点,这似乎可与闻一多的想法相呼应^{[2](37)}。唐宋时期(尤其是宋)是科举制度定型和推广的时代。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豪门对政治权势的垄断状况。在逻辑上,任何一个人,哪怕他不名一文,都可以通过科举,步入上流社会,把持朝政大权。比如宋祁兄弟关于贫富的论争,可以说是十分生动地反映出这类士大夫的内在心态^①。

唐宋之后,贵族集团对政治权力的世袭特权被取消了^②,士大夫无非是皇权的雇佣者。这种状况势必造成心理上的失落:既然这家国一体的王朝兴亡与我个人无干,既然我只是一个被雇佣者,那么,操心那么多的经国济世的文章又有何用?晏殊所谓“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多少有些“旁观者”的意味吧?至于张养浩公然宣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则更多地反映着封建文人的价值中枢已经开始偏离皇权,而向百姓日益靠拢了。

士大夫本身的日常生活方式也决定并体现了这种变化。在唐以前,士大夫的主要生活轨迹就是“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他们是以一个高贵者的姿态来塑造自身性格的。然而到了唐以后,两重力量铸造了文人的双重生活形态:一方面,科举的大门永远对他们打开着(像唐寅这样的人只能是例外),不管你是18岁还是80岁,总有一朝登龙门的希望,因此就需要保持着庙堂文人的品格;同时,未得意或失意以后的生活又必须回归在民间,很多文人又不得不“学得文武艺,货于市井家”,其文艺创作趣尚就不得不迎合这类新的读者群。为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的这些传统士大夫们,尽管一生受着传统典雅的文学熏陶,而一旦有某种特殊因素促动,玩起“通俗文学”来总是那么得心应手,似乎连任何过渡都不需要,比如宋代的柳永,比如大批大批的元曲作者,比如明代的康海、王九思、冯梦龙等人。士大夫的这种双重审美趣尚,在文艺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即便是最正统的“诗教”,也不忘“上以风化下”,文学产品的终端接受者似乎仍然是老百姓。白居易搞新乐府,固然是为政治目的服务,但创作实际中又必须考虑妇孺老妪。至于李渔、王骥德等人,干脆标举戏剧的创作目的是给“不读书的人”看的^{[3](24)}。这种矛盾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性灵说”的提倡者袁宏道那里。他在《叙小修诗》中深深地苦恼着:一方面,按照传统的“文人气习”,认为那些语言本色的作品是“疵处”;另一方面,又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极喜其疵处”。

这种矛盾,正是传统士大夫双重审美趣尚的产物^{[4](第3卷,211)}。

探讨了上述因素,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学在唐宋以后开始了某种转变。大约从唐中叶开始,士大夫就开始介入了民间文艺写作,比如词和唐代的一些传奇。文人的文学作品,过去基本上被贵族阶层所占有,此时逐渐扩散到了民间,到了元明时代,为民间而进行的创作诸如戏曲、小说等,完全可以和传统的诗文并驾齐驱,甚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就意味着某些近现代文学的精神——我们所谓的近现代文学,是指那些以平民或大众的审美取向为标准而进行的文学活动。

二、文学消费主体的演变与文学精神转变

文学创作主体介入民间创作,追求民间的审美趣味之所以能够成立,根本上还在于具有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消费者或文学接受主体——市民阶层的崛起。

自有都市之日起,就有市民。但市民并非一开始就是都市的主角。早期的都市主要是作为政府机构的住所或军事集结地,市民不过是附庸。随着都市的经济意味逐渐增强,市民的作用也日益凸现。直至都市经济成为都市生活的命脉——王公贵族和官僚将士的生活保障不再依赖外来的贡赋或配给,而是通过商品交换来满足,市民就成了都市的重要力量。杨宽先生的研究指出,中国的都市结构演变有两个大阶段:在唐宋以前,其核心结构是封闭式的“市”;唐宋以后,则以开放式的“街市”为主体。导致前者向后者演变的根本原因是都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都市经济的空前繁荣。杨宽先生还进一步把这个演化时期具体考证在唐代晚期至北宋中期^{[5](192)}。这个时期与我们上述的士大夫转变期不谋而合。

开放式的街市的形成,凸现了市民娱乐消费的份量,因为“街市”是“以酒楼、茶坊为中心的”^{[5](289)}。《梦粱录》《东京梦华录序》《都城纪胜》等当时文献中屡有文字描绘都市勾栏瓦舍的盛况。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生动地再现了宋朝城市的繁荣景观。据史料记载,东京人口稠密,民户比汉唐增加10倍;城区内商业贸易往来频繁。杨宽先生还特地讨论了宋仁宗朝以后“不闻街鼓”的情况^{[5](309)},其意义恐怕就在于市民的需求压倒了官府的传统。所有这

一切,都表明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趣味成为都市的主导。这种文化趣味最大的特点就是喜闻“淫秽鄙亵之事”^{[6](856)},也就是“俗”。

市民阶层是一批无关政治命运的人群,他们只是作为经济的存在体而生活着。他们感性,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进行文艺消费,同时他们也为从事这类文艺活动的士大夫文人提供了生存保障,他们不奢望自己成为上流社会的显贵,只追求生存的快乐和金钱物欲。他们的存在,使作为政治道德附庸的文学发现了自身愉悦价值的一面。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娱乐场所的产品,比如词、说话,以及戏曲等等。词兴起于盛唐,而目前见到的最早的话本也大约在这个时候,这当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力量提高的见证。

蒙古入主中原,对中原传统的农业经济有过暂时的破坏,但由于元人的重商主义,其都市文明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兴盛。我们可以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窥见一代都市的风貌:汉八里新城周长就有二十四英里,居住着无数的显贵商贾和外国人,其中光妓女就有二万五千人——这需要多大的经济力来支持^{[7](97-119)}。

除了都市文明的繁荣,元代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汉族文人地位的下降,所谓“九儒十丐”乃是当时文人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仕途的狭窄,民族的歧视,迫使元代文人更多地以市井为生。关汉卿的《不伏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无奈而又坚定的情怀——到市民中间去,与市民同命运,才是文人的出路,难怪标榜为一代之文学的“元曲”具备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市民气息,可以说,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向近现代文学转变,元代的政治经济政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三、文学主体的生活形态与文学话语的转变

明清时代的都市更加繁荣,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更强大了。与之相配合的是那些适合市民情调的文学体裁的成熟。戏曲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小说创作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巨著,具有浓郁日常生活情趣的散文小品兴起于明代,即便是正统的诗歌领域,也出现了“真诗乃在民间”的鼓与呼。

以前,一说到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滥觞,人们习惯于归结为西学东渐和由梁启超等人发动的诗界革命

等等。但是,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中国士人能够很快阻断绵延了几千年的古代文学的传统惯性,熟练地操起为平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并几乎一夜之间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如果没有长期的内部酝酿,火山是不会突破坚硬的岩层喷射千仞,奔泻万里的。试想,如果中国的小说还处在《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时代,梁启超诸君又怎会看上它,拿来作为开发民智的工具?如果没有长期的关于本色语言的探讨,没有晚明小品絮语如话的创造,中国文学如何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话语的转变?应该说,是传统文学中一些既有的、本身适合市民口味的、适合近现代文学风尚的文学样式和话语,为创作主体和消费主体展现其近现代化转变的活动提供了基本舞台。

当然,笔者从来不否认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新学思潮对文学变革的意义。但在这之前,明代的心学及其异端已经为文学的平民化作了哲学准备,王阳明推崇百姓日用,李贽更是讲求“穿衣吃饭”。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已经在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明代的社会风尚,也是影响文学观念变革的重要因素。明代中期,皇帝荒淫无耻,宦官专权,体制瘫痪,整个国家陷入了极端混乱无序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滋长了享乐主义,而越是皇权专制,越喜欢鼓励人民进行低级趣味的享乐,以此抹杀严肃的思考,皇帝本身也越可以荒淫恣肆。城市经济的发达,娼楼妓馆遍布东南。谢肇制《五杂俎》称为:“娼妓布满天下”。像秦淮河的灯船和河房、扬州的二十四桥风月、西湖的曲里风情可谓名噪一时。同时,统治体系的瘫痪使异端思想有了滋长的温度。个性解放的思潮,在时代性爱风气炽盛的情形下,借用“情”的外衣,鼓吹对理学的反叛,鼓励了对物质、自由和享乐的追求。一时间的社会风尚,完全颠覆了官方提倡的“禁欲”的理学道德观。^{[8](59-109)}

文人的生活形态自然也与此相呼应。在明代,文人在思想上没有任何的自由,清高倔强和卑鄙权诈都是皇权打击的目标,这样文人就只剩下“行尸走肉”一条路了。许多文人采取的是“放浪于三教之外”的安全的退身之路,像“吴中四子”等人,就干脆纵情酒色,连诗中描写的,也无非是美人美酒之类。而市井经济的发达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风气,更加强了这种享乐主义。比如,明初曾有严文,规定各级人等的服装。但是很快就变成一纸空文,人们争相着奇装异服。士民的服装样式,由过去的几十年不变,发展到一年一换,花样繁多,令人目不暇接。房

屋雕梁画栋,精美异常。日用器皿,从家具、酒杯到尿壶,都镂金饰玉。可以说,中国人把全部的智慧与人生寄托,都放在了日常的享乐上面了^③。

这种社会风尚和生活趣味表现在文学上,除了充斥着大胆的男女爱情甚至色情的描写之外,文学话语的日常生活化和平民化也是明代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上面已经谈到袁宏道对本色语的暧昧态度。其实在明代,语出本色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学标准。明代剧作家何良俊对“本色”作如此强调:“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9](第3卷,99)}王骥德《曲律》进一步解释道,“本色”就是要让“老姬解得”。其实这就是主张通俗,主张贴近民间。李渔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予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予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做予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3](第3卷,24)}

我们知道,戏剧的繁荣来自于市民阶层的崛起,而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平和欣赏趣味大都比较低,因此,对戏剧通俗性的重视,实际上就是文学大众化的一个体现。其最突出的要求就是需要大众的话语权。这不但在上述的戏曲观念中,就是一直被认为典雅专利的诗歌,也开始有了新的呼声。袁宗道公然质问:“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10](第3卷,196)}。在这里,不管他是不是自觉,已经开始了对传统古雅的贵族文学的反叛。他肯定“街谈巷语”,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话语”本身,而更深层次的,是要肯定这种话语的生存“语境”——那些里巷妇孺们的生活欲望的流露与表现。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说,较之文人诗篇,“闺阁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更有流传价值,因这些歌谣“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4](第3卷,212)}我们通过公安派的主张,可以看到晚明时期总的文学思潮的变化。尽管在表现世俗情怀和人欲个性方面,诗文创作远不如小说、戏剧那样露骨,但是,他们的理论取向却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如果说明代以前,中国的士大夫还主要是因为生计等原因被动地进行民间创作的话,那么,明代以后,士大夫则是在主动寻求向民间文学转变的语言途径了。

四、余论

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学史,严格地说,只是一部士大夫文学的流传史,或者说,是一部“文本史”。然

而,正如古人云,“真诗乃在民间”,^{[11](第3卷,55)}民间文学其实是当时文学的主要成分,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流传下来罢了。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12](50)}主要是就“文本”历史而言。然而,文学的活动,根基在于人对文学的需要。这种需要不单单是上层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更多的还是普通民众的。但在早期的文学,由于传播工具被垄断在士大夫手里,流传下来的文学也只能是士大夫文学。随着教育的不断往下层渗透,也随着历史上士大夫社会政治地位的不断变更,文学的传播情况越来越复杂了,民间文学不断顽强地在“文本”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强烈,并最终更多地与士大夫文学融合,而我们的“文本”文学史也越来越接近文学史本身的全貌。这也是各代文学的主流特征能够从比较纯粹的士大夫文学——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历经民间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相糅杂的“唐之诗,宋之词”,并最终走到更加贴近民间的“元之曲”和明清小说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即文学传播或接受学的角度来看,这“一代之文学”又体现了文学史另外一种重要的演变线索,那就是:从民间文学到庙堂文学,再从庙堂文学到民间文学的一个“否定之否定”。

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对文学的需求和接受就处在“言志”与“观志”的矛盾当中。一方面,广大民众和作为“民众角色”的统治者和士大夫,对文学的需求是“言志”,所谓“诗言志,歌永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3](6)}另一方面,作为“执政角色”的统治者和士大夫,对文学的需求则是“观志”,所谓“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4](1708)}所谓“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14](1755-1756)}并“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3](10)}在这个阶段,由于士大夫作为统治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渴望的目标就是将民间的文学变成代表自身地位的修养和教育子弟的科目,变成政治运作的手段,是“以为刺”“用大谏”的工具。因此,士大夫并非文学的创作主体,而是改造主体,所以孔子才说“诵《诗》三百,受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5](55)}也就是说,学《诗》如果不能用于仕途政治,单纯的文学欣赏多也是没有用的。

《诗经》的命运如此,屈原的作品也浸透了浓郁

的政治功用色彩。《离骚》固然抒发的是个人忧愤情怀,但却主要是政治情怀;而他的其他作品,更多的改造民歌巫乐以备庙堂祭祀之用。虽然当时的楚风尚未被中原“温柔敦厚”的“诗教”所熏染,但作者的生活功利取向也不得不将文学作品的文学本身功能降为比较低的地位。更有甚者,后人在对屈原的解读中,完全把屈赋变成了政治比附的工具。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6](第1卷,155)

汉代的大统一产生了大赋这种典型的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而“乐府歌行”更明白地透露了国家将民间文学引入庙堂文学指向的心态。《礼记》对诗教的总结标志着这种文学指向的最终成熟,这与士大夫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官僚阶级的正式形成,对文人提拔荐举制度的完善与太平盛世的优裕生活和自信心态,使得文学接受目的进一步明确为“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调整统治行为的文化工具。只有到了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社会的动荡加剧,政治的日益黑暗,最后是战乱频仍,士大夫失去了稳定的生活形态和优裕的生活地位,仕途蹇滞、生命朝不保夕,士大夫们已无暇也无心情再将文学作为庙堂生活的游戏,而更多地恢复到其本来的状况,将文学作为抒发个人意趣的载体。这就是所谓的“文的自觉的时代”。尽管六朝的骈文依然作为庙堂文学的代表在贵族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古诗十九首》的生存忧患、建安诗歌的慷慨多气、玄言诗的独思冥想、山水诗的自得其乐,都反映了士大夫这一文学的接受体在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上向文学的本来面目,即民众文学的一般审美趣味靠拢的迹象。

这个趋势更随着都市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得到了加强。都市文化造就了一批稳固的、富有的和稍有文化的文学接受者,他们当然需要新的文学体式来适合他们的趣味。唐宋时代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量的都市文化接受群体,由此而出现的诗歌尤其是词曲的繁荣,说明了文学创作主体对这个接受群体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的吸收、融合与迎合。文学的庙堂色彩被冲淡了,其创作者的主体意识的凸现成了主流。但是,当时文学主体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终究与普通民众不同。唐宋科举制度的完善,天下英雄皆入朝廷彀中,使得士大夫首要关心的还是他们的庙堂生活,因此,他们对民间文学的吸取与参与更多的还是将其士大夫化、庙堂化,宋代关于词的

“尊体”之争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因此,如果没有重大的社会文化变革,士大夫文学与民间文学在精神上的最终融合是不可能完成的。

然而,历史终究给予人们这样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元朝的建立。它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状况最终把士大夫文人一棍子打到民间,使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进一步向民间靠拢,甚至出现完全民间趣味化的文人。中国的士大夫文学与民间文学的融合真正开始了,民间文学终于走向前台,普通民众成了文学的主要接受者,他们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成为文学创作主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中国文学史向近代化发展的关键转折期,是中国文学大众化不可或缺的环节,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价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明清时代是文学从庙堂到民间转变的发动时期。沿着元代奠定的审美风尚和体裁成熟的基础,明清士大夫更是受着市民意识觉醒的召唤,将个人主义、平等观念等等市民情趣和思想引入了文学,使文学精神开始自觉地向大众靠拢。大量成熟的以民间消费为目的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和明确的以民间趣味为标尚的文学创作原则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文学精神向近现代化的转变已经正式开始。自此,中国文学的近现代化之路已经不可逆转了。晚清时代那一场耻辱的民族灾难,只是催熟了 this 转变之果。

注释:

- ① 王得臣《麈史》卷二:“(宋庠、宋祁)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另钱世昭《钱氏私志》:“(宋庠)居政府,上元夜,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喻所亲令消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齋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齋煮饭是为甚底。’”
- ② 据《旧唐书·高士廉传》载唐太宗制定新的《氏族志》时,明确主张“我今特定种姓者,欲崇重今朝之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 ③ 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一文中坦白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囊诗魔。”可为注脚。

参考文献:

- [1]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第10卷)[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2] 包弼德. 斯文: 唐宋思想的转型[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3] 李渔. 李渔全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 [4] 袁宏道. 叙小修诗[A]. 中国历代文论选[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5] 杨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6] 赵(9). 因话录[A].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7]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 [8] 吴存存. 明清社会性爱风气[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9] 何良俊. 曲论[A]. 中国历代文论选[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0] 袁宗道. 文论[A]. 中国历代文论选[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1] 李梦阳. 诗集自序[A]. 中国历代文论选[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2] 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7.
- [13]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4]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5] 朱熹. 论语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8
- [16] 王逸. 离骚经序[A]. 中国历代文论选[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From noble to popular: Inner motif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o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AI Yin, YANG Yu

(College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o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ega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developed in Yuan Dynasty, and achieved its maturi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is is the result based o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ternal development system. Firstly, the dualism of traditional scholars-officials'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fered the subjective motif that pushed literary creation to transform to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econdly, the emergence of new literary consumers, basically the continuous strength of citizenship determined the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esthetic tendency. Thirdly,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maturity of some literary models and types, which were suitable for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uch as novels and theatres, provided an arena for this transformation. Lastly, the environment that influenced the literature activities, that is, th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and fashion formulated the basic models of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noble literature;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ditional scholars-officials; citizen literature

[编辑: 苏慧]